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

人民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 民 大 版 社

目 录

序言	3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7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 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10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16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22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27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 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31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44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48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	56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60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 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70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 缩小?	75
十三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84
书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94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94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101
三 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109
注释	119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¹

写于 1905 年 6—7 月

1905 年 7 月在日内瓦
第一次印成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9 卷，在排印第三版时，
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
一次校订

序　　言

在革命时期，人们很难跟得上事变的发展，它为评价革命政党的策略口号提供异常丰富的新材料。这本小册子是在敖德萨事变^①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²（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②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过程起义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到自己的论敌方面去了。革命无疑是那样迅速、那样彻底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代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毫无疑问，革命会把社会民主主义教给俄国的工人群众。革命会在事实上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它将揭示出各种社会阶级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我国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农民的真正趋向；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但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旧民粹派的旧幻想，例如在“社会革命党”纲领草案中那样清楚地显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在我国“社会”的民主主义性质问题上、在农民起义完全胜利的意义问题上的那一切幻想，都将被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彻底吹散。革命将第一次给各个阶级以真正的政治洗礼。这些阶级将以一定的政治面貌在革命中出现，它们不仅会在自己的思想家的纲领和策略口

① 指“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34页。——编者注

号中，而且会在群众的公开的政治行动中显示出自己。

革命将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对一个战斗着的政党来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使革命达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彻底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半途性和叛卖性？

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另一方面，又需要工人群众用实际的战斗力量来支持这些口号。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更要特别加紧进行。在这种时候，工人阶级本能地要奋起进行公开的革命的发动，而我们就必须善于正确提出这种发动的任务，然后尽量广泛地使人们知道这些任务，了解这些任务。不要忘记，在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问题上流行的悲观主义，现在特别经常地掩蔽着人们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念。毫无疑义，我们在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全部问题却在于这种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政治重心应当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工会和合法社团方面呢，还是放在武装起义，放在建立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府方面？两种工作都可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当然，两种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在当前的革命中，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重心将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前一方面呢，还是放在后一方面？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

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中的觉悟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解放》杂志³就赞扬阿基莫夫主义，即社会民主党内现在把工会和合法社团提到首要地位的“经济主义”。因此，司徒卢威先生就欢迎（《解放》杂志第72期）新火星派中阿基莫夫主义的原则趋向。因此，他就拼命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表现的那种可恨的革命狭隘性。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轻视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例如，《火星报》⁴第104号已在事实上转到它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论敌方面去了，但它同时又轻视走在实际生活前面的、为运动指出前进的（虽然也会遭到一些挫折，犯一些错误等等）道路的那些口号和策略决议的意义。恰恰相反，制定正确的策略决议，这对一个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仅仅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的政党来说，是有巨大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余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社”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不同于只是在革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在这本小册子里往往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条深渊。（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才开始研究日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就是仔细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和代表会议的策略决议，判明哪些决议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向，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这本小册子就是专为这一工作而写的。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策略，这对那些不愿局限于口头的劝说，而真正想造成策略上的一致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将来的完全统一提供基础的人来说，也是必要的。

尼·列宁

1905年7月

一 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

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意见是不一致的。现在可以看出三种政治趋向。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必要，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这个代表会议成为全民的和立宪的会议。按报纸所载关于布里根委员会⁵工作的消息来看，沙皇政府似乎同意召集一个有严格的资格限制或严格的等级限制并在没有鼓动自由的条件下选举出来的谘议性会议。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要求政权完全转归立宪会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仅力争普选权，不仅力争完全的鼓动自由，并且要立刻推翻沙皇政府，而代之以临时革命政府。最后，由所谓“立宪民主党”⁶的领袖们表明其愿望的自由资产阶级，并不要求推翻沙皇政府，不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不坚持切实保障选举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公平，使代表会议能成为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其实，作为“解放派”唯一重要的社会支柱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力求沙皇和革命人民达到尽可能和平的妥协，并且要这种妥协使它自己即资产阶级获得的政权最多，而使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获得的政权最少。

这就是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就是和现代俄国三种主要社会力量相适应的三种主要政治趋向。至于“解放派”怎样用假民主的词句来掩饰他们那种半途性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他们那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政策，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第3、4、5号)^①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4—462页和第479—492页。——编者注

上不止一次地谈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会民主党人怎样估计目前的任务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会议”在最近分别通过的两个决议，便是进行这种工作的最好的材料。在这两个决议中，究竟是哪一个把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得更正确，哪一个把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规定得更正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愿意自觉地执行他所担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责任，都应当十分细心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完全抛开那些和问题实质无关的考虑。

党的策略是指党的政治行为，或指党的政治活动的性质、方向和方法。党代表大会通过策略决议，就是要确切规定全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造成这种新形势的，是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同沙皇政府的彻底、坚决和公开的决裂。新问题就在于采用什么实际方法来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至于在理论上，关于这个会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党早已在自己的党纲中先于其余一切政党而正式解决了）。既然人民已经和政府决裂，而群众又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新制度，那末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党，就必须考虑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将被推翻的旧政府。于是就发生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新问题。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回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党就应当阐明：第一、临时革命政府在当前发生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中的意义；第二、自己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第三、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明确的条件；第四、在这个政府没有社会民主党参加时从下面对这个政府施加压力的条件。只有把这一切问题阐明后，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行为才会是有原则的、明确的和坚定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以下就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

鉴于：

(1)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具体了解革命的最可能的进程，具体了解革命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我们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当前的一切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二)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尝试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

(三)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

(四)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是完全和专门论述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说的只是临时革命政府，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这里完全没有例如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撇开不谈，是不是做得对呢？无疑是对的，因为俄国的政治局势根本没有把这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刚刚相反，现在全体人民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党代表大会应当提出来解决的，并不是某个著作家适时地或不适时地涉及的问题，而是由于时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现在的革命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的一般斗争中，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了这个问题，它一开头就指出，“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无论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来看，或是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必需的。而为了得到充分的政治自由，就必须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正

如我们的党纲早已认定的那样。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强调民主共和制的口号，这在逻辑上和原则上都是必要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民主战士，他们正是力求争得充分的自由；而且，这样强调在现在尤其适当，因为在我国，正好是在现在，君主派即所谓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正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出台活动。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是全民的（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的）和立宪的会议。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就肯定了的。可是，这个决议并不就此止于此。为了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新制度，单是把代表会议叫作立宪会议是不够的。必须使这个会议拥有“立”出东西来的权力和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就不以“立宪会议”这个形式上的口号为限，而补充了唯一能保证这个会议真正执行它的任务的种种物质条件。这样指出能使口头上的立宪会议变成事实上的立宪会议的种种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以立宪君主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故意歪曲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要把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

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只有临时革命政府，而且是作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临时革命政府，才能保证竞选鼓动有充分的自由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呢？谁想驳倒这个论点，他就得肯定地说，沙皇政府可能不援助反动势力，沙皇政府能在选举时保持中立，沙皇政府能关心于民意的真正表现。这样的断语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公开地替它们辩护，但正是我们的解放派在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暗地里偷运这类东西。立宪会议必须有人来召集；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必须有人来保证；这个会议必须有人赋予它以全部力量和权力；只有作为起义机关的革命政府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它才有力量采取一

切办法来实现这一点。沙皇政府一定会反对这样做。和沙皇妥协分赃而且完全不依靠人民起义的自由派政府，决不能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它极其诚心诚意地愿意这样做，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来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和十分彻底的民主的口号。

可是，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末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就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现在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对于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拼命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所有的人前面并且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能忘记新的斗争。

可见，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部分决议中是估计得很全面的：无论是就它和争自由、争共和制的斗争的关系来说，就它和立宪会议的关系来说，或者是就它和为新的阶级斗争扫清基地的民主革命的关系来说，都完全估计到了。

下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一般应当怎样？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就直接劝告全党，说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确信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工人阶级应当认识到这种必要。“民主派”资产阶级把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掩藏起来，而我们却应当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并坚决主张必须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此外，我们还应当给这个政府指出一个适合于当前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民主

派的任务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就是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即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一方面，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实现，另一方面，又是为继续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样，决议就完全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目的。按其起源和基本性质来说，这个政府应当是人民起义的机关。按其正式的使命来说，它应当是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工具。按其活动内容来说，它应当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派的最低纲领，因为这是唯一能保障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人民的利益的纲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临时政府是临时性的机关，不能实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批准的建设性的纲领。这样的反驳只不过是反动派和“专制主义者”的诡辩而已。不实行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就是容忍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的农奴制关系继续存在下去。能够容忍这种关系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们的政府，而决不是作为人民起义机关的政府。如果有人以立宪会议也许会不承认集会自由为借口，而主张在立宪会议承认这种自由以前，不要在事实上实现这种自由，——那岂不是开玩笑！反对临时革命政府立刻实现最低纲领，正好就是开的这种玩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上提出实现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

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如果某些工人在相当的时候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实现最高纲领，我们会回答他们说，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还格格不入，阶级矛盾还没有发展起来，无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你能在全俄国各地组织几十万工人吗？你能争取几百万群众同情我们的纲领吗？你试着去做做看，而不要光说些听起来很响亮但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你马上就会知道，要实现这样的组织任务，要进行这样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各种民主改革。

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已经阐明了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和无产阶级对它的态度，于是就发生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即从上面行动）？我们又应当怎样从下面行动？决议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了明确的答复。在决议中毫不含糊地声明说，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民主革命时代，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时代），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作了这样的声明，就是坚定不移地既和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线，又和社会民主党内那些用我们势必要参加这个政府这样的前途来恐吓我们的尾巴主义者（如马尔丁诺夫和新火星派）划清界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这样

的声明，就坚决地驳斥了新《火星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⁷；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尊崇，原则上是不可容许的，等等。

但是，说原则上可以，当然还不是说实际上一定适当。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这个新的斗争方式，即“从上面”斗争的方式，是适当的呢？显然，各种具体条件，如力量对比等等，现在还无从谈起，所以决议自然就不预先规定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现在就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预先作出任何断言。但是我们参加的性质和目的，却是可以而且应当确定的。决议也就是这样做的，它指出了我们参加的两个目的：（1）同反革命尝试作无情的斗争，（2）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自由资产者正开始热烈谈论反动派的心理（见司徒卢威先生发表于《解放》杂志第71期上的那封极有教益的《公开信》），力图吓倒革命的人民，并促使他们对专制制度让步，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人们注意真正对反革命作战的任务，是特别适当的。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由强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强力，积极使用这种强力，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从巴黎公社时期以来，几乎毫不间断地笼罩着欧洲的长期的政治反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考虑“从下面”行动，使我们太习惯于只注意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现在无疑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在俄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必须宣传从上面行动的思想，必须准备采取最坚决的进攻的行动，必须研究这种行动的条件和形式。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这些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事的形式方面的（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另一个是

关于这种参加的性质本身的（一分钟也不忽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决议既这样从各方面阐明了党关于“从上面”行动这个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又估计到了我们将来无法从上面行动的那种场合。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样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

我们就此结束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的简要分析。读者可以看出，这个决议把新问题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党从临时革命政府里面和外面行动的政策都一一阐明了。

现在来看看“代表会议”的相应的决议吧。

三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专论“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①。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包含着一种糊涂观点。

① 读者把本书第 400、403、407、431、433 页上所引各段集合起来，便可得到这个决议的全文。（作者在 1907 年版上加的注。见本书第 15、20、25、58、62 页。——编者注）

一方面，问题提得很狭窄：只提到我们参加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谈党在临时革命政府方面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其实，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如果按这几个字的直接的和通常的意义来说，正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把这几个字了解为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为民主革命夺取政权，那末，既谈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又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代表会议派”自己还不大清楚他们究竟应当说什么：是要说民主革命，还是要说社会主义革命。谁留心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这种糊涂观念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在他那本有名的《两种专政》中开始提出来的，新火星派不乐意提起这一典型的尾巴主义著作中所提出的（还在一月九日事件以前提出的）问题的提法，但是这一著作对代表会议有思想上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决议的标题。至于这个决议的内容，则暴露出无比深刻、无比严重的错误。下面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或者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或者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总之，他们是说，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既可能是胜利的起义，又可能是……代表机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该怎样来理解呢？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且这样的“胜利”又和“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等量齐观！！代表会议竟没有觉察到，胜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表示革命在事实上胜利，而“决定”召开立宪会议

是表示革命仅仅在口头上胜利。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出东西来，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从任何代表的“决定”到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 1848 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⁸ 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代表会议拿来和彻底胜利等量齐观的东西，正好是缺乏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东西。承认我们党的共和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要了解这个奇怪现象，就必须来看看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从党内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决议^①。决议指

① 现在把这个决议的全文引述如下：“代表大会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自从和经济主义作斗争以来，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方面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色彩，其特征就是一般趋向于降低觉悟成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意义而使其服从于自发成分。在组织问题方面，这些色彩的体现者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和党的按计划规定的工作不相适应的过程组织原则，在实践上多半是自搞一套和党的纪律相违背的办法，要不然就向党内觉悟最低的一部分人鼓吹不顾俄国现实生活的客观条件而广泛应用选举的原则，企图以此破坏目前唯一能维持党的联系的基础。”

出，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同经济主义有血缘关系的”各种派别。我们的代表会议派（马尔丁诺夫对他们的思想领导确实没有白费）关于革命的推论，和经济派关于政治斗争或八小时工作制的推论是一模一样的。经济派开口闭口都要搬出“阶段论”：（1）为权利而斗争，（2）政治鼓动，（3）政治斗争；——或是（1）十小时工作制，（2）九小时工作制，（3）八小时工作制。这个“过程策略”引起的结果，是大家都充分了解的。现在，“代表会议派”建议我们把革命也预先好好地分成几个阶段：（1）沙皇召集代表机关，（2）这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3）……关于第三阶段，孟什维克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忘记了：人民的革命的压力将碰到沙皇制度的反革命的压力，因而不是“决定”不能实现，便是问题又得由人民起义的胜利或失败来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也和经济派的下面这种推论完全相同：工人的彻底胜利，不是表现为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表现为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和“决定”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 真是一模一样。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决议的制定者并没有想把起义的胜利和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机关的“决定”等量齐观，而只是想预先规定党在前后两种场合下的策略。我们的回答是：（1）决议的原文是直截了当地和毫不含糊地把代表机关的决定叫做“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许这是措词疏忽的结果，也许它是可以根据

在策略问题上，他们力图缩小党的工作的范围，反对合乎党性的对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完全独立的策略，否认我们党可能和宜于担负起组织人民起义的使命，认为我们党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当参加临时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会责成全体党员在任何地方都要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反对这种局部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倾向，但是代表大会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附和这种观点的人，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即在他们承认党代表大会和党章而且完全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党的组织。”（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记录纠正的，可是在没有纠正以前，它只能包含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完全是解放派的。（2）决议的制定者所陷入的“解放派”的思想进程，在新火星派的其他著作中更是表现得鲜明无比。例如，在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⁹（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火星报》第100号曾经称赞过它）上登载的《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竟说什么“选择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的活动中心”（我们补充一句，关于国民代表会议的召集，我们还连半点确切的消息都不知道！）的“策略”，比武装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对我们更有利”。我们往下还要回头来谈这篇论文。（3）预先讨论党在革命胜利时和革命失败时、在起义成功时和起义不能扩展为重大力量时的策略，是一点也不应当反对的。沙皇政府也许能够召集一个代表会议来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分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预见到这一点，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到“虚伪的政策”，“假民主”，“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¹⁰。可是，问题在于这一点不应当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说，因为这和临时革命政府没有关系。这样做会把起义和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撇开，会使问题变样，等等。现在的问题并不

① 下面就是关于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政府为了保存自己，一面加强通常的、主要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觉悟分子的高压手段，同时又（1）企图用让步和进行改良的诺言从政治上腐蚀工人阶级，从而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革命斗争；（2）为着同一目的，给自己的虚伪的让步政策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从邀请工人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和各种谐议会起，一直到成立所谓国民代表会议之类的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为止；（3）组织所谓黑帮，煽动人民中所有一切不觉悟的或者被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所迷惑的反动分子来反对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责成一切党组织：

（一）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同时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一方面要着重说明这些让步是出于不得已，另一方面又要着重说明专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实行可以满足无产阶级的改良；

是各种情况都可能：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可能走直路，也可能走弯路，而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可以使工人对真正革命道路的认识产生糊涂观念，决不可以象解放派那样把缺少胜利的基本条件的东西叫做彻底胜利。也许我们连八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而只有经过长远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但是，如果有人竟把无产阶级不能打破拖延、耽搁、妥协分赃、叛变和反动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叫做工人的胜利，那末你会怎样说这个人呢？也许俄国的革命将以“立宪流产”结束，如《前进报》^②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但是，这难道可以为那些在决战前夜把这种流产叫做“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吗？也许在最坏的结局下，我们不仅争不到共和制，而且宪法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希波夫式的”宪法¹⁰，但是，难道这就可以原谅社会民主党人抹杀我们关于共和制的口号吗？

当然，新火星派还没有走到抹杀这个口号的地步。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已经丧失到什么程度，毫无生气的说教已经把他们和当前的战斗任务隔离到什么程度，这从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恰巧忘记谈到共和制这一点特别看得清楚！这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口号都在代表会议的各种决议中得到

(二) 利用竞选鼓动向工人解释政府这类措施的真实意义，并说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立宪会议。

(三) 组织无产阶级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

(四) 组织武装抵抗来反击黑帮以及所有一切由政府领导的反动分子的发动。”（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② 日内瓦《前进报》是我们党内布尔什维克部分的机关报，于1905年1月开始出版。从1月至5月，总共出版了18号，从5月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同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他们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前进报》停刊，开始出版《无产者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承认、重述、解释和详细说明，甚至工人应按企业选举理事和代表的事情也没有忘记，只是没有找到机会在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中提及共和制。说到人民起义的“胜利”，说到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不指出这些“步骤”和行动同争取共和制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斗争，而是为了拐着腿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尾巴后面走。

总起来说，决议的第一部分：（1）完全没有从争取共和制和保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方面阐明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2）把正好还缺少真正胜利的基本条件的局面拿来和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等量齐观，从而就直接搅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意识。

四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度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决议的下一部分：

“……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这样的胜利都将是革命时代的新阶段的开端。

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自发地提到这个新阶段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为实现自身的社会利益和直接占有政权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彻底铲除全部等级君主制度。

因此，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按历史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必须调节获得了解放的民族内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从而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

我们把构成决议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这一段议论分析一下。这一段议论的基本内容是和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三点所叙述的内容相当的。可是，如果把两个决议中的这一部分拿来对照一下，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决议有下面这样一个根本的区别。代表大会的决议简略地说明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后，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各阶级为争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非常确定的斗争上，并且把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提到第一位。代表会议的决议则冗长地、模糊地、混乱地描写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非常含糊地说了一下为一定的成果而进行的斗争，而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说，在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铲除旧制度。而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了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将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而他们一定会企图）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一定的阶级为明确的最近目的而斗争。代表会议的决议则谈论各种势力的相互斗争。一个决议表现出积极斗争的心理，另一个决议则表现出消极观望的心理；一个决议里响彻了生龙活虎地行动起来的号召，另一个决议里则充满死气沉沉的说教。两个决议都说，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准备进到第二步的第一步，但是一个决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另一个决议则简直淹没在对这第一步的冗长的描写中，而且（恕我说句粗话）一味狂吻着这第一步。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旧的但万古常新的思想（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把它当做引言或前提来作出既为民主革命又为社

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先进阶级负有先进任务的结论。代表会议的决议始终停留在引言上，咀嚼着这个引言，并在这个引言上面卖弄聪明。

这种区别也就是一向都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派的那种区别，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流行的那些年代分为说教派和战斗派，在群众运动兴起的时代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必须扭转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碍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反之，政治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出作不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在我们的斗争的根源愈深，我们就应当愈广泛、愈大胆、愈坚决、愈主动地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在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还是同样的争论。民主革命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的需要和要求，——我们根据这样一些前提出作结论说，先进的阶级必须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民主主义任务，必须更明白地彻底说清这些任务，提出共和制作为直接的口号，宣传必需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必需无情地击溃反革命的思想。而我们的论敌新火星派根据同样的前提出作了这样的结论：不应当彻底说清民主主义的结论，在实践的口号中可以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可以不宣传必需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的思想，可以把召集立宪会议的决定叫做彻底胜利，可以不把对反革命作斗争的任务提出来作为我们的行动任务，而可以把它淹没在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措词不当的，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以“相互斗争的过程”为借口的议论中。这不是政治家说的话，而是冬烘先生说的话！

你愈是仔细地研究新火星派决议中的每个说法，就会愈加明

白地看出它的这些基本特点。例如，他们说什么“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各种成分……相互斗争的过程”。我们记起决议所论述的问题（临时革命政府），就要疑惑地问道：既然说到了相互斗争的过程，怎么可以绝口不提那些在政治上奴役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分呢？代表会议派是不是以为只要他们假定革命胜利，这些成分就会消失呢？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荒谬可笑的，而局部来说是政治上的极端幼稚，政治上的极端近视。在革命战胜反革命以后，反革命并不会消失，相反地，还必然会更加不顾死活地进行新的斗争。既然我们的决议是分析革命胜利时的任务的，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击退反革命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把一个战斗的政党的这些当前、紧迫和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淹没于一般的谈论中，说当前的革命时代过去以后会怎样，在将来已有“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社会”时会怎样。经济派曾经引用政治服从于经济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的不了解，现在新火星派也和他们一样，引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社会内部将发生斗争的一般真理，来掩饰自己对于从政治上解放这个社会的刻不容缓的革命任务的不了解。

就拿“彻底铲除全部等级君主制度”这句话来说吧。说得明白些，彻底铲除君主制度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是我们的善良的马尔丁诺夫和他的信徒们认为这样说太简单明了了。他们一定要“加深”一下，一定要说得“聪明一些”。结果，一方面是枉费心机，令人可笑。另一方面，所得到的又不是口号而是描写，不是雄壮的前进的号召而是一种忧郁的向后回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恰恰不是马上就要为共和制奋斗的活人，而是一种 *sub specie aeternitatis*^①、

① 从永恒方面。——编者注

用 plusquamperfectum^① 观点来观察问题的僵硬的木乃伊。

再往下看：“……临时政府既要负起责任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从这里立刻就可看出，我们的代表会议派忽略了摆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面前的具体问题。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具体问题，在他们的眼睛里竟被将来有许多政府会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所遮蔽了。如果你们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问题，那末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例子都会向你们表明，正是许多根本不是“临时”性质的政府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甚至战胜了革命的政府都毕竟不得不去完成这个被打敗了的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被叫做“临时革命政府”的，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革命时代的政府，它直接代替被推翻了的政府，它所依靠的是人民起义，而不是什么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政府是争取革命立刻胜利、争取立刻粉碎反革命尝试的机关，而决不是完成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任务的机关。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家在将来的《俄国旧事》¹¹ 上去确定究竟哪些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是由我们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这是过三十年再去做也不算迟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践的指示来。

我们上面所摘录的那段决议中的最后几个论点，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能令人满意。临时政府应当“调节”各个对立阶级的相互斗争一语，是极不妥当的，至少是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使用这种自由主义解放派式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以为可能有些政府不是阶级斗争的机关，而是阶级斗争的“调节

① 早已过时的。——编者注

者”…… 政府必须“不仅推进革命的发展，而且极力反对革命发展中那些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因素”。这些“因素”恰恰就是这个决议所代表说话的那个无产阶级！这个决议不指明无产阶级目前究竟应当怎样“推进革命的发展”（把它推进得比立宪派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远些），不劝告无产阶级准备好一定的办法，等到资产阶级掉转头来反对革命的成果时，就和资产阶级斗争，却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说到我们活动的具体任务。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对根本和辩证法观念不相容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见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这个世界¹²。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虽然走得很起劲，但是领导得很不好，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且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所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上起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意义。

五 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

我们把这个决议的下一段引录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应当竭力保持这样的地位：使自己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手无策，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

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

政党。”

劝告我们占据最有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只是除了这个很好的劝告以外，我们还想得到直接的指示，指出正是在现在，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在关于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的谣传、猜测、议论和计划层出不穷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不懂得主张人民和沙皇“妥协”这种解放派理论的危险性，把仅仅“决定”召集立宪会议就叫做胜利而且不积极宣传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不提民主共和制的口号的人，是不是能在现在把革命推向前进呢？这样的人事实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因为他们在政治实践方面是停留在解放派立场的水平上。他们既然在规定党在革命时期的目前任务和最近任务的策略决议中，不提为共和制而斗争的口号，那末他们承认用共和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的纲领，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其实，解放派的立场，即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立场现在的特征，就是把决定召集全民立宪会议当做彻底的胜利，而对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制的问题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换句话说，要使革命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所能把它推到的那个限度，就必须积极提出一些绝对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的口号，强调这些口号，把这些口号提到首要地位。这样的口号现在只有两个：（1）临时革命政府，（2）共和制，因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是君主派资产阶级已经接受了的（见“解放社”的纲领），其所以接受这个口号，正是为了把革命藏起来，为了不让革命完全胜利，为了使大资产阶级能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但是我们看到，代表会议把这两个唯一能够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口号中的共和制这个口号完全忘掉了，而对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又简直把它拿来和解放派的全民立宪会议口号等量齐观，把两者都叫做“革命

的彻底胜利”!!

是的，这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件事实会成为将来的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历史学家的路标。社会民主党人在1905年5月举行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决议说了一些必须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的漂亮话，而事实上却把这个革命拉向后退，并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一步。

新火星派喜欢责难我们，说我们忽视无产阶级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我们倒很想看看，谁能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文把这个责难证实一下。我们给我们的论敌的回答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不在某些个别场合下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在这方面，我们和你们的差别就是我们和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但不和它打成一片；而你们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并肩行进，也不和它打成一片。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君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事实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①。可是，只有完全不知道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顺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

① “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任务。

导能同我们并肩行进的这个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降低到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按政治趋向来划分各个巨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做一个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也和我们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做一个东西时一样，加上一些限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①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请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做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末，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和新火星派心目中的那种彻底胜利），那末，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如果象《火星报》那

① 我们还不说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

样滥用这个概念，这种怀疑是很可能发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就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莫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的”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

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方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这种见解是最错误不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归根到底不是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便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

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出于畏惧当局，才为革命的道路成为可能而悲叹，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日子报》，并且还有不合法的但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

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改革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上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①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以近视自夸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

① 见《解放》杂志第 71 期第 337 页注 2。

阶级的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说不上了。当问题在于对现在的革命给予民主主义的领导，在于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在于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简直真正变成了“套中人”，以愁眉苦脸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为满足。现在，问题的实质，即你们诸位先生所看不见的问题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而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妥协分赃来结束；是将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精疲力竭”于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现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正好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无可比拟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又复活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细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从新火星派的决议中摘录下来的那段文字里面，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

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理取闹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方面转变的成分的时候起）。我们毫不隐讳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就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在事实上会从哪一方面发生。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会从哪一方面发生，是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方面发生呢，还是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方面发生。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并不在主观方面，而是在客观方面；并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是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要被溶化，——我们所说的根本不是这件事。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自立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毕竟是一件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

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
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
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
作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
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
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
这个时代很久以前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的发展
进程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
有两种可能的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沿着资产
阶级民主方向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
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所
起的作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
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2）或者是取得彻底胜利的力量不够，结果便是沙皇政府和资产
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妥协分赃。无穷无尽的
细节和配合的情况，谁也不能预先看到；但是总的说来，结局总
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是从这两种结局的社
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
结局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束手无策”）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
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
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
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
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词句，我们

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决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尝试。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

活水平的基础，最后，last but not least^①，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却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去斗争的时候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影响还很小很小；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唯一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无条件地证明了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且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① 就先后次序而言的最后，不是就重要性而言的最后。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末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实行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妥协分赃。那时，结局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一切最坏的情况中的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讽刺性的写照。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时日，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制兴隆的时日，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的发展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会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

这个问题只要很清楚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用与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当初所说的，“用平民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 1848 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

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 Marx' Nachlass 梅林版第 3 卷第 211 页）¹³ 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个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事实上，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山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对付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丝毫不破坏现存制度；殷勤恳切，彬彬有礼，象绅士们一样带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克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所带的那副从刽子手上脱下来的手套，见《无产者报》第 5 号①）。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称呼，——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万恶的农奴制度、亚洲式的暴政和侮辱人的政策的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 1793 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真正的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93—497 页。——编者注

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翼（机会主义者一翼和革命者一翼），就象十八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翼，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只有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①，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认为是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

① 斯塔罗维尔在他的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的决议¹⁴中就企图这样做；代表会议在同样不妥当的决议中也企图这样做。

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提倡组织上的涣散，以至于主张在党内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刊物离开党；轻视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从分析决议而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从其他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而说话坦白的孟什维克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七 “把保守派排斥于 政府之外”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孟什维克梯弗里斯“委员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的那篇论文，叫做《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该文作者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的纲领，他提出了共和制的口号，但是他谈到策略问题时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制)，可以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毫不理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组织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另一条道路是宣布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行动的中心，拿着武器来影响它的成分和活动，并用强力迫使它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或通过它来召集立宪会议。这两种策略是极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一种策略对我们更有利。”

看吧，俄国的新火星派分子就是这样叙述后来体现在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个决议中的思想的。请注意，这是在对马事件以前写的，当时布里根“草案”还根本没有出世。当时，甚至自由派都已经忍无可忍，并且在合法的刊物上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而这位社会民主党新火星派分子却比自由派更为轻信。他宣布国民代表会议“正在召集”，并且非常相信沙皇，竟主张把这个还不存在的国民代表会议(也许是“国家杜马”或“立法议会”吧?)当作我们行动的中心。我们的这位梯弗里斯人比代表会议所通过的那个决议的起草人坦白直率，他不是把(他叙述得绝顶幼稚的)两种“策略”等量齐观，而是宣布第二种策略“更有利”。请听吧：

“第一种策略。大家知道，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要把现存制度改变得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阶级，甚至连资本家自己，都对政府持反对态度。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和战斗着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起行进，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攻击专制制度的。政府在这里已经完全孤立，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因此，要消灭它是很容易的。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很高，因而还不能单独实现革命。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它就会不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而要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我们的利益是在于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不能把资产阶级拉过去而把无产阶级置于孤立地位……”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在于要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报竟然不叫做“解放”而叫做

“社会民主党人”，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弗里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彻底弄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派的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呵！那末，我们说新《火星报》的议论并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否则无产阶级一定失败，政府一定胜利。这正是专制政府努力争取的。它在国民代表会议中毫无疑问地会把贵族、地方自治机关、城市和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的代表们拉过去。它会设法用一些微小的让步来笼络他们，从而使他们和它自己和解。它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巩固起来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打击已经陷于孤立的工人大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幸的结局。但是，这难道是可以按第一条道路做到的吗？假定我们丝毫不理会国民代表会议而独自着手准备起义，并且有那么一天拿起武器跑到街上去斗争。那时，我们碰到的敌人就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政府和国民代表会议。当我们还在作准备的时候，它们已经达成协议，成立了协定，制定了有利于它们的宪法，并且把政权瓜分掉了。这是直接有利于政府的策略，我们应当最坚决地拒绝……”

说得多么坦白呵！必须坚决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否则政府就会“在这个时候”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分赃！恐怕就是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的旧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东西稍微近似于这种玷污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论调。时而在那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和风潮已经是事实。国民代表会议只是布里根的诺言。而梯弗里斯城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下定决心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等候着“影响的中心”，即国民代表会议……

“……反之，第二种策略是要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不让

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不让它和政府妥协①。

当国民代表会议和专制政府斗争的时候，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而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此分开②，把激进派拉过来，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我们采用这样一种策略，就能使政府经常陷于孤立，使反对派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

好了，好了！现在让人们去说我们夸大新火星派转向最庸俗的经济主义方面的事实吧。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致：先把苍蝇捉住，然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这样苍蝇就杀死了。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几乎是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

可怜的俄国呵！人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子。我们还没有什么议会，甚至布里根也还没有答应设立议会，而议会迷¹⁵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这种干涉应当怎样实现呢？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③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以法律规定④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尽可能指定得晚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叫人民认识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各个委员⑤。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⑥，而只

① 用什么办法去剥夺地方自治派的意志呢？是用特殊的石蕊试纸吗？

② 天呵！这是多么“深奥的”策略！在街上斗争没有强力，而要“把代表们分开”却可以用“强力”。梯弗里斯的同志，请你听着，胡扯也要知道一点分寸……。

③ 是在《火星报》上公布吗？

④ 是由尼古拉来规定吗？

⑤ “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⑥ 我们既有如此正确而深奥的策略，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迫使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保卫者应当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就会一同①走向民主共和制。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

读者不要以为这一大篇不可思议的谬论只是某个不重要和没有威望的新火星派分子的习作。不是的，这是在新火星派的整整一个委员会即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上说出来的。不仅如此，《火星报》第 100 号还直接称赞过这篇谬论，而把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评论如下：

“第一号编得生动而有天才。显然可以看出编者兼作家的经验和才干……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纸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呀！如果这个任务是要向一切人具体表明新火星派的思想已完全腐化，那末这个任务真是“出色地”完成了。谁也不能更加“生动地、有才能地和巧妙地”表示出新火星派已经堕落到自由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地步。

八 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 71 期）中，猛攻我国各极端政党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

① 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被排斥于政府之外的”保守派吗？

满①。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真是无比地满意，因为在我同新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原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时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
次②，而现在我们还要说它一次。

① “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主义的基础也已经被历史冲毁而且完全冲跑了。”好厉害的攻击。只是司徒卢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做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生提出他永远不能接受的挑战就够了。试问：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呢？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方向不相同的特别方向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令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¹⁶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徒卢威先生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

而我们要对读者说的是，自由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段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没有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形容为“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和考茨基一类的人物。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还把倍倍尔形容为“好孩子”以训诫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呵，这是老一套的办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上你的当。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

② 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52号）曾受到《解放》杂志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倾向于对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它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一篇短评中特别加以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甘愿效劳的自由派》）。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9号的短评）。最后，斯塔罗维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而“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庄严姿态加以恭维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了一种愿望，想叫青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竭诚欢迎这种愿望。司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再好不过地证实了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呵，请你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长久搁置下去吧！）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是资产阶级很了解，可是于它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也许工人不算人民，而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呵，*Ca dépend*，这还要依情况为转移呢。无论沙皇政府或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剥夺地主土地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的办法，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方面总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近。

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也是暂时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应用于 1905 年的俄国，就恰巧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不愿向专制制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进攻，他就没有资格称为革命的拥护者。

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是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末象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不是我们双方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大会确实经常是“秘密”举行的。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怎样呢？司徒卢威先生呵，你在拥护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人们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固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从技术意义上说的革命，那就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用民主改革的思想来熏陶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完整而周密的人民武装

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的情况，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确切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对某个具体事变的绝对把握的问题，那根本用不着去说它。所要说的，——如果你真想拥护革命的话，——是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鼓吹，并且立刻努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能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而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底细。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妥协分赃，而不愿把它击溃；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到工人身上（这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已经使武装斗争“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预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觉醒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庸俗的革命主义者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

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即绝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并且也不是能够勉强造成的发动）的历史时代。尾巴主义的革命家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甚至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叛卖行为或这种愚蠢的说教遗臭万年的历史实例。

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和尾巴主义的革命家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 1901—1902 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而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是遥远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叫喊“冲锋”（《工人事业》¹⁷），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那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有“文人气”和书生气（纳杰日丁）¹⁸。反之，尾巴主义的革命家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社会民主派抱什么态度呢？它攻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者，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当然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在我们当时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总是要迟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惶失措的

锱铢必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唠唠叨叨地谈论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真正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国性的政治报纸作为准备起义的工作的核心，而这种报纸就是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被事变超过，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

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政府自己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吗？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专制政府手中的“论据”而活动的么？难道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这位极其温和而又规矩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着（唉，不过是为了推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我们今天正是怎样！）“现在是使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

谁愿意睁开眼睛来看看，他就不能怀疑站在革命方面的人现在都应当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影响的不受检查的机关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

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① 中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一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

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个很有影响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和骚乱是缺少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人的。武装起义实在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

① 以下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1) 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2) 这个运动目前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

(3) 无产阶级一定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而它的参加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 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它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5) 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各个有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 通过宣传和鼓动，不仅向无产阶级说明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说明这一起义的实践方面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二) 在进行这种宣传和鼓动的时候，说明群众政治罢工的作用，说明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的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

(三) 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来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设立由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一工作。”（作者在 1907 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

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务是准备起义。起义不可能按计划进行。顺利的起义条件，是由政府的紊乱、我们的鼓动、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严重的意义”。

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更重要得多的（是在1905年，而不是在1902年），是大体上说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严重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同志们呵，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因转向马尔丁·诺夫主义方面而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懂得你们的政治哲学已经证明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懂得你们已经成了（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复背得烂熟的东西和练习说教的时候，你们竟没有看到——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使人民群众潜移默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

九 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考察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我们已经指出，新火星派的策略并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虽然他们也许是想用自己的决议来保证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把它拉向后退。我

们已经指出，正是他们的这种策略使社会民主党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而决不能预防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从决议的不正确的前提中，自然就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请看看这个结论的前一半即提出目的这一半吧。新火星派是不是把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当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目的提出来呢？是提出来了。他们不善于正确表述彻底胜利的条件而错误地用了“解放派”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竟提出了上面那个目的。其次，他们是不是把临时政府和起义联系起来呢？是的，他们直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说临时政府是“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最后，他们是不是提出了领导起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们虽然也象司徒卢威先生那样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起义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但是他们同时又和司徒卢威先生不同，而说“社会民主党力求使它（起义）服从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并利用它来谋取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岂不是说得头头是道么？我们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起义服从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并利用它来谋取我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集团”），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权。我们的目的是使起义胜利，以便成立临时政府（“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分得政权的目的！！

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动摇于两种观点之间：一种是司徒卢威先生托辞拒绝起义的观点，一种是革命的社

社会民主党号召着手实现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的观点。他们动摇于两种主义之间：一种是原则上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斥责为叛卖无产阶级的行为的无政府主义，一种是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有领导影响的条件下要求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马克思主义^①。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既没有抱定要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因而必然在起义问题上躲躲闪闪、支吾搪塞的司徒卢威先生的立场，又没有抱定斥责任何“从上面”行动和在任何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新火星派把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和对沙皇制度的胜利混为一谈。他们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比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稍稍前进了一点。他们甚至同意领导人民的起义，但是主张起义胜利后（也许是在起义快要胜利时？）马上就放弃领导，即主张不享受胜利的果实，而要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用起义来谋取工人阶级的利益”……

用不着再继续分析这个糊涂观念了。倒不如来考察一下用“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句话表述出来的这个糊涂观念的起源吧。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修正主义者或反机会主义者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完全不合时宜。在为了适合于没有任何议会存在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竟提出了议会斗

^① 见《无产者报》第3号《论临时革命政府》第二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1—449页。——编者注）

争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机械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一切站在革命方面的人都想着并且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愿意“始终如一地”象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极了！他们甚至在表述出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时，也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原理。他们没有思想，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当起义正在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用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由武装起来的公民用进攻的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正象我国民间故事中那个有名的主人公总是恰巧在不适当的场合重复他的吉利话一样，我们的马尔丁诺夫的信徒也是恰巧在他们自己都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重复着和平的议会斗争的说教。在一开头就提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人民起义”的决议中，竟隆重地提出“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口号，这真是再可笑没有了！诸位先生，请你们想想吧：在起义时期“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是什么意思？是揭露政府呢，还是推翻政府？是投票反对政府呢，还是在公开的战斗中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是拒绝补充政府的国库呢，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夺取这个国库，以供起义、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及召集立宪会议之用？诸位先生，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只是消极的行动，即揭露，投票反对，表示拒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概念仅仅和议会斗争有关，而且是在谁也不把“彻底胜利”当做斗

争的直接目的提出的时代才使用的。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从政治上被压迫的人民为拚命争取胜利而开始全线坚决进攻的时候起，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工人们现在问我们，是否要努力进行刻不容缓的起义工作？怎样使已经开始的起义获得胜利？怎样利用这个胜利？胜利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什么纲领？正在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回答说：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那末，我们把这些骑士叫做庸人中的头等角色，难道叫得不正确吗？

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刺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而且容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于《火星报》上（第93

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是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并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是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只是局部、暂时等等的夺取)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起义,如该决议第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¹⁹,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给它一个什么名称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外来的和“新的”字眼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宣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呢?象彼得堡这样发生过一月九日事件的地方不也是一

个“城市”吗？象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也是一个地区吗？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局和国库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不是在决议中一开头就说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去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去引导它作“局部的”斗争，而不作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斗争呢？既然你们自己提到在一个城市里“夺取政权”时是说为了“使起义扩大”，那末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设想要是为了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希望是为了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糊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一般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给了一个详尽而明白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勉强地任意地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逃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弄得一团糟。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末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

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遥远的响声……或毫无内容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珍视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而引用它来敷衍了事。这样做就是重复布朗基派（在他们的1874年的“宣言”中）崇拜公社的每一个行动而被恩格斯讥笑过的那种错误²⁰。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不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过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无论援引巴黎公社或者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一定要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所不应当模仿的那个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表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是恰好表明你们不成功地竭力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么？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

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又是眼光短浅和态度轻率。“革命公社”，即甚至是以一个城市为限的革命政权，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必定要以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地方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虽然没有供给我们什么新材料来批判在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多少有点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新旧交替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最好地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会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象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

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到什么地步。我们不谈那些细节问题，例如荒唐地假定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我们也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根本已经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根本不知道什么社会主义改革，而只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只把《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拿来说说。《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估计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从而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指出的这些话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准备，怎样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准备去利用”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叙述道，实际“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可能”，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

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这两个阶级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在这里，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没有提供丝毫肯定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肯定地应当决定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决定于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肯定地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除无产阶级以外，我们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末“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的，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目的不只是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是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有限的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这并不等于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也没有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

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指这个革命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①。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

① 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击溃得愈快，这种统一性就结束得愈快。

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唯其如此，我们和资产阶级“一起打”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加以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加以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就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²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旦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

么民主专政等等，那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详细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使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²²

(1)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了这位意大利(后来的)改良主义者领袖，叫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²³。恩格斯在1894年论到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 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14号)^①完全承认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而斗争，第二种力量是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7—262页。——编者注

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十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一个粗略的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个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策略方向和代表会议决议的策略方向之间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问题来说吧。你们将再次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机的一切复杂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最后，要回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回击黑暗反动势力”一事只是在关于如何对待其他政党这一问题的决议的理由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制度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不

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用标有“关于经济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单独的决议来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显得不够和落后，是一望而知，无须证明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事情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事情，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活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活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来准备下特别的机关——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为俄国将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据点。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七零八碎，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决定“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国所有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方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开始执行它的这个忠告，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们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据点的口号，而是：第一、仅仅关于“职业”工会的私下提出的建议（党员必须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些著作家的杂感和随笔。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基础上的问题，根本没

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会议制定了“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首要的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鼓动工作的中心实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向立宪会议提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固呢？——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查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应当只进行自己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力求领导和独立进行整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常常想要社会民主党人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政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历程中也是想要我们老老实实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旁边，而让资产阶级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要在每次代表大会上列举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坏资产者和好资产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维尔的错误，硬想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塔罗维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

取得协议等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别开来的企图，都只会得出一种立刻就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维尓认为“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己毫不中用，普选制的口号已为解放派所接受，但是解放派不仅没有因此而接近于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行武装的事业”。分界线是划得更加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己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可是偏偏不要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4号）^①。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合新火星派的一切“要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其无纲领的

① 在1905年6月4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7—478页。——编者注）。在这篇论文中叙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取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决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在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作者在1907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照旧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反对所有一切虽然打着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俄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决不是“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表面上很严厉、实际上毫无力量、因而显得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热狂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形式,并不在于写好和印好的要求,也不在于预先区别虚伪的“人民之友”和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毫不减弱的批评。为了“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要象代表会议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要善于提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的任务。

十二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几节写好以后，我们接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Pour la bonne bouche（为了做一个好的结束），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比这更好的材料。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前进’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

对的还是对的。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在括弧中指出它所开放的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

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呵！），“而为了保证党对于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

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前十个月作出的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号²⁴），“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压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使国家制度达到可能办到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由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为止的迫切需要”（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已经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这就是症结之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互相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只要想一想：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把路让给它走。如果指导我们的是——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

级做买卖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都表明了。我们在上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发现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明确的原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而且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打倒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而彻底的民主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工人同志们呵，还是躲在你们的狗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对这个名词的马尔丁诺夫的或新火星派的“理解”直接产生了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想它，他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试回想一下伯恩施坦主义的《Credo》²⁵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只管真正的工人事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不陷入“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呵。谁要是把《Credo》的全文或《工人思想报》²⁶第9号（1899年9月）附刊阅读一遍，就可以看出这一整个的推论历程。

现在也是这一套，只是范围较大，是应用于估计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罢了，——唉，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

论家们所庸俗化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行动的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该读作：“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从上面实行“改良”的自由还是让它们资产阶级去享有吧。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²⁷。他们白白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名字，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模仿他们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而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要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任务而把这些民主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那些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这就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妥协分赃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种可能结局中的第一个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买卖，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恰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晕眼花，因而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写的任何一篇论文，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的

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进行到底，力图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不考虑那个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而和人民一起去努力实现革命，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样“不考虑”，而惟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瞎叫什么有人责备你们自觉地出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潭，正象旧时的经济派那样顺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遏止地、一去不复返地滚到专门从事于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革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和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与革命为敌的是专制制度、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一般和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①。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

①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在《L'Humanité》²⁸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72期上。

派即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只要它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会远远走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因此，无产阶级也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资产阶级会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的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是如“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下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要有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

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单用学校尺度来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象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地，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农民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上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君主党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有本事说革命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意，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具体决议来推翻自己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抽象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

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做到《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考虑不周而害怕的那个地步的力量）。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们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忽略了的一种情况。不要忘记，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要在哪一条道路上寻求这一任务的解决。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把革命的规模扩大到十分雄伟和不可战胜的地步是容易还是困难，而在于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意见分歧恰恰是关于行动的根本性质，关于行动的方向。我们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老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问题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达到或是否很快会达到的问题。

后一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或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

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十分严重的注意。忘记吸引群众（不仅是吸引工人阶级群众，而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的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获得最大的利益：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御人民的“资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主义”的“贞节”。但是有困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忱，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忱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不经过战斗，我们决不会把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会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参加临时政府的事，请你们连想都不要去想，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就会因之缩小！

一个决议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推进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个决议说：你们连想都不要去想独立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难道不显然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策略吗？前一种策略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唯一正确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

而易见的吗？

十三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不大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或者不知道我们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党内斗争史而从旁判断的人，谈到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歧时，也常常简单地借口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敷衍了事。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须展开宣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运动的战斗的、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应当特别夸大，无论在哪里（如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是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引号里的“政治”）秘诀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老是被用来掩盖人们对党的迫切的和紧急的需要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还不能造成任何危险，还不能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比较一下，就立刻可以看出这种分歧。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说运动中有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知道，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真正的政治危

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知道，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会因我们提出某些策略口号（也许因为我们缺乏某些口号）而得到便宜。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批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作，而过分迷恋于军事准备、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党所面临的真实危险完全是从另一方面发生的。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的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移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及时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把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提旧事的把戏当作真事看待。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刺眼，这就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真实危险。在执行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些团体和小组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已经了解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丝毫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很固执地反反复复地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基本的和不变的主题，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串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正因为它是已经解决了并且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提出口号而一味讲述引言，不是除了确认旧的东西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地和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这种旧的东西，千方百计地撇开新的东西，不能定出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力求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

的行动可以证实这种流言。另一方面，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
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现
在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来推自己的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和所
谓“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方
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持极端要求的“革命主
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扬这个决议的事实，对这一
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使资产阶级因无产阶级参
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呵！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确定了把
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
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别加以
赞扬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
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
例在更大范围中研究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
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
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
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施坦这样说，因
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纯防御的策略，鼓
吹“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骂革命
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雅各宾主义”，大骂不懂“工人的自动性”的“著
作家”以及其他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连
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
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白地提出革命任
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
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使资

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想法。dürfen wir siegen? “我们敢不敢胜利?”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翼之间的这一分歧。初看起来，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提出过，而且是应当提出来的，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使它不敢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能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由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过，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²⁹ 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企图讥讽一下，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象还没有把狗熊打死就争着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话只是表明，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谈论仅仅从传闻中知道的事情也是要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距打死狗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还不太近，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狗熊的争论已具有原则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巨大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距能够“打死自己的狗熊”（实现民主革命）的时间还不太近，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狗熊的

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前途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是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地和成功地集合军队，领导军队。

就拿我们的老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曾大声叫嚷，说他们的论敌是阴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杂志，特别是第10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时的演说），说他们的论敌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忘却工人运动的基础，不顾及工人的自动性，如此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自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忽视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还善于尽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自动性和纯阶级的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是把工人阶级交给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支配，即是把党拖上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是把党拖上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份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份内的

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领导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而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一翼。在组织方面，他们开始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而终结于“过程破坏”，他们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章程”³⁰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事业脱离党组织的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协议”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派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派面前发言叫作“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是在一月九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武装自己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等任务，它们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芒。“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于政治口号。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

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主张骚乱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此否定或轻视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总是只能得到暂时的效果而且同时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认为，能拯救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谁轻视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表变为工联书记。谁轻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他们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需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他们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顾虑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了解的道理，他们不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平分土地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即在备受压抑、闭塞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革命的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以首创精神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轻视这些任务，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躲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末谁也不能责备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顾虑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打击革命热情，那末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斥责它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³¹。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

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怕革命，因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如果我们将被迫循着这条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畏首畏尾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害怕反动势力想要实行恐怖手段，也不害怕资产阶级想要退出。工人并不期待妥协分赃，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谋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大风暴时期，比起在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平静“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地吮吸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大船可能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能够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定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丢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坐着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种策略手段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

书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71—72期和《火星报》第102—103号，给我们在这本书第八章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决没有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考察最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论文（《解放》杂志第72期），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给社会民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绝对应该把这两篇论文从头到尾读一遍，并且仔细考虑其中的每一句话。我们先把这两篇论文的主要论点转述如下：

“在局外人看来，——《解放》杂志说道，——使得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难捉摸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也是没有详尽无遗地说明问题。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掀起暴动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所以‘列·

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相当接近，在他们的意识中，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模糊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摈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暴动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形式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种类的对其他反政府派别实行的实际有益的妥协。反之，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现实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完全一贯地实行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创作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解放》杂志的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然后就发表了关于这些决议的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待武装起义的”。“由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见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并推翻了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斯塔罗维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有好感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用革命手段没收地主等等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作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100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内使真正的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党必须对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主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高声喊道：

“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决议，因为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在策略上有了省悟的表现。”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在这些判断中的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倾向，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无疑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末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在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虽然他对这种意义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最严重注意。

那末，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悟、实事求是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义、

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察到我们的出版物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一翼，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者一翼。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实事求是、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力争成为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这确实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解放派心目中的含意，这是从这个名词过去在《解放》杂志和司徒卢威先生的用法中也可以看出来的。《火星报》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有这样的含意。例如，请回想一下《火星报》第73—74号附刊上那篇题为《是时候了！》的论文吧。该文作者（他一贯地体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泥潭派”的观点）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真正代表者的作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幻影的作用”。《火星报》编辑部不得不立刻来纠正《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说法，而在按语中宣称：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派别。”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

主义”（《火星报》第102号）时，丝毫不提自由派称赞过它的现实主义的事实，这是因为这种称赞比任何斥责都要辛辣。这种称赞（《解放》杂志表示这种称赞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证明了自由派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现实主义”（应读作：机会主义）趋向，即新火星派因其整个策略立场的错误而在他们的每一个决议中显示出来的那种趋向，是同一个血统的。

其实，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在“全民”革命中的不彻底和自私自利，——既暴露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议论中，又暴露于大批自由派报纸的全部论调和内容中，还暴露于大批地方自治派、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一切站在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克维奇、罗迪切夫这些先生们一边的人们的政治言论的性质上。资产阶级当然并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但是总的说来，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总是能够很好地觉察到：一方面，无产阶级和“人民”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有用的，就是说，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当作摧毁专制制度的攻城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并且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对它又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尽一切力量来使无产阶级满足于在革命中起“适度的”作用，使无产阶级清醒些、实际些、现实些，使无产阶级的活动以“不要使资产阶级退出”的原则为标准。

有学识的资产者非常清楚，工人运动是他们阻止不了的。因此，他们并不出来反对工人运动，不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他们甚至极力赞美罢工自由，赞美文明的阶级斗争，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解为布伦坦诺式或希尔施-敦克尔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愿意把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事实上是工人自己差不多已经争得的自由）“奉送给”工人，只要工人抛弃“骚乱主义”，抛弃“狭隘的革命主义”，不再仇视“实际有益的妥协”，不再追求和

渴望在“俄国全民革命”上面刻下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标记，刻下无产阶级一贯性、无产阶级坚决性、“平民雅各宾主义”的标记。因此，有学识的资产者在全国各地用尽千方百计，通过书籍^①、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资产阶级的）头脑清醒，要（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³²，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来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自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不经心的读者和无见识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做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

这一整套规模巨大的（按其影响群众的广度来说）偷天换日的资产阶级把戏，归根到底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化为主要是工会运动，使工人运动远远地离开独立的（即革命的、以实现民主专政为目标的）政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把《解放》杂志的公式颠倒过来了。这是一个绝妙的公式，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

① 参看普罗柯波维奇《俄国工人问题》一书。

作用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资产阶级想叫无产阶级只进行工会运动，从而“用《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这和《Credo》的伯恩施坦派作家们用“纯粹工人”运动的思想来模糊工人意识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完全相同。反之，社会民主党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为无产阶级参加到俄国全民革命中去领导革命这样一个局面，即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个特殊的阶级，就应当局限于自己的阶级斗争，就应当为了“理智”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工会和使工会合法化这上面，就应当正是把这些工会看做“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你们自己最重要的出发点”，就应当在革命时期制定一些象新火星派的决议那样多半是“郑重”的决议，就应当爱惜那些“对自由派比较有好感的”决议，就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表示愿做“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的人们的领导，就应当“保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如果你们不幸已被这种“不科学的”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所沾染的话）。

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说道，我国的革命是全民的革命，因此，你们既然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就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这个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这个革命。因此就不应当局限于被狭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范围内，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们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内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此，虽然不要忽视工会运动，不要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你们应当在革命时代把实行武装起义、建

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这样，新火星派的决议因“路线”错误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怎样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因而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喜爱的立场，就不用多说了。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马尔丁诺夫发表在《火星报》第 102 号和第 103 号上的论文。马尔丁诺夫想证明我们把许多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话解释得不正确而他却解释得正确，当然我们不去驳斥他的这种企图。这种企图是很不严肃的，马尔丁诺夫的遁词是一望而知的，问题是很容易识破马尔丁诺夫在实行全线退却时所玩弄的不很巧妙的诡计，何况《无产者报》一部分编辑人员准备的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所著《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通告》(1850 年 3 月)³³ 的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只要从马尔丁诺夫的论文中引证一段话，就足以使读者明白马尔丁诺夫的退却。

马尔丁诺夫在《火星报》第 103 号上说，《火星报》“承认”“成立临时政府是发展革命的可能而适当的道路之一，而它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适当性，正是为了要在将来完全占有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火星报》现在已经承认，它的一切顾虑——怕革命政府必须对国库和银行负责，怕把“监狱”拿到自己手里来会有危险而且还会拿不到自己手里来等

等，都是毫无根据的。《火星报》依旧只是糊里糊涂的，它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为了掩护退却，糊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新《火星报》的糊涂虫中间，马尔丁诺夫是个特出的角色，是头号的糊涂虫，甚至可以说是个天才的糊涂虫。他每次大卖气力“加深”问题而把问题弄糊涂时，几乎总是同时“想出”一些新的公式，把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全部虚伪性暴露无余。请回想一下，他在经济主义时代如何“加深”普列汉诺夫，而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的公式。这真是经济派的全部著作中最恰当不过地表明了这一派的全部虚伪性的公式。现在也是如此。马尔丁诺夫很热心地替新《火星报》效劳，并且几乎是一说话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出色的新材料来评价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他在第102号上说列宁“偷偷地用专政的概念代替了革命的概念”（第3版第2栏）。

实际上，新火星派加给我们的一切罪名都可以归结为这个罪名。而我们是多么感谢马尔丁诺夫加给我们这样一个罪名啊！他提出这样一个罪名，是在我们和新火星派的斗争中给了我们一种多么宝贵的帮助！我们真要请求《火星报》编辑部多多地让马尔丁诺夫出来反对我们，“加深”他们对《无产者报》的攻击，并且“真正有原则地”表述这些攻击。因为马尔丁诺夫愈是努力要说得有原则些，就说得愈糟糕，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新火星派的破绽，愈加成功地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向大家做有教益的解剖，使人们看到新《火星报》的原则如何被 *reductio ad absurdum*（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用专政的概念“代替”了革命的概念。《火星报》不愿这样“代替”。最可敬的马尔丁诺夫同志，事情正是这样啊！你无意中说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你用新的说法

证实了我们的意见：《火星报》是在做革命的尾巴，走入了象解放派那样表述革命任务的迷途，而《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则提出了要把民主革命引向前进的口号。

马尔丁诺夫同志，你不懂得这一点吗？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不妨费点气力来给你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毫无用处，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另一方面，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的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也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之间、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派的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在向前行进着，并且正在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无论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定的“条款”（如斯塔罗维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之类）来定出一个界限，借以鉴定资产阶级与自由为友的这种虚伪态度或资产阶级与自由为友的这种叛卖自由的行为，必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团烈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见风使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偏右，老是在讨价还价，老是在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批判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揭露资产阶级的花样翻新的、难以预料的妥协和背叛。

请回想一下司徒卢威先生在秘密报刊上发表政治言论的历史，回想一下社会民主党和他交战的历史，这样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实现这些任务的。司徒卢威先生开始是提出纯粹希波夫式的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见我发表于《曙光》杂志的论文：《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①）。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用他们的君主主义立场为例证来揭露他们的民主主义所具有的经纪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揭露这些解放派钱包英雄廉价出卖伟大俄国革命的利益的企图。

最后，专制政府冥顽不化，国内战争大踏步前进，君主派使俄国陷入绝境，这些已开始冲破了最保守的脑袋。革命已成为事实。现在已经不是只有革命家才承认革命的时候了。专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在腐烂下去，而且就在大家的眼前腐烂下去。正如一个自由派（格烈迭斯库尔先生）在合法刊物上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局面。专制制度虽然表面上还很强大，但是它已软弱无力；日益发展的革命事变已经简直就把这个活活地腐烂着的寄生机体推到旁边去了。自由资产者不得不以事实上正在形成的现有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或者更正确些说，进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7—63页。——编者注

行政政治投机)，开始觉得必须承认革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革命家，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责怪专制政府助长革命，因为这个专制政府不愿妥协，而想拼死斗争。他们是天生的买卖人，仇恨斗争，仇恨革命，但是客观情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

我们亲眼看到一种非常值得玩味和非常滑稽可笑的情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娼妓竟企图穿上革命的外衣。解放派，——risum teneatis, amici!①——解放派开始代表革命说起话来了！解放派开始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怕革命”（司徒卢威先生语，见《解放》杂志第72期）！！！解放派已表示要“领导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进步，而且更标志着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方面的进步：这个革命运动已经迫使人们对它表示承认。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站在革命的基地上是比较有利的，足见专制制度已被动摇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另一方面，证明了整个运动已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的这一现象，又向我们提出一些也是新的、也是更高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某个思想家个人是否诚实，资产阶级承认革命不可能是诚心诚意的。资产阶级是不能不把自私自利和不彻底的本能、小商人的习气和小小的反动诡计，随身带到运动的这个更高的阶段中来的。现在，为了贯彻我们的纲领和发展我们的纲领，我们应当另行规定革命的当前的具体任务。昨天足够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够了。昨天，把要求承认革命作为先进的民主口号也许是足够的。

① 且慢发笑，先生们！

现在，它已经不够了。革命甚至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对它表示承认。现在，要求于先进阶级的，是确切规定这个革命的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的内容本身。司徒卢威先生们虽然承认革命，但是立刻就一次又一次地露出马脚，又唱起陈腔旧调，说什么可能达到和平的结局，说尼古拉将召请解放派先生们上台执政，如此等等。解放派先生们承认革命，目的是要比较安全地驱除这个革命，出卖这个革命。现在，我们应当向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指出革命这个口号是不够的，指出必须清楚而毫不含糊地、彻底而坚决地把革命的内容本身确定下来。而能够这样确定革命内容的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正确表明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³⁴。

滥用字眼原是政治方面最普通的现象。例如，一再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既有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现在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We all are socialists now»——哈尔科特说），又有俾斯麦的信徒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朋友。“革命”一语也完全可以让人们滥用，而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要被人们滥用的。当司徒卢威先生以革命的名义说起话来的时候，我们由不得要想起梯也尔来。在二月革命前几天，这个穷凶极恶的矮子，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变节行为的理想代表人物，就嗅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于是他在议会讲台上宣布，说他是革命政党中的人！（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³⁵）。解放派转到革命党这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相同的。当俄国的梯也尔们开始说他们是革命政党中的人的时候，这就是说，革命这一口号已经不够了，已经什么也不能说明，任何任务都不能确定了，因为革命已经成为事实，而各色各样的人都纷纷跑到革命方面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现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俄国的整个结构的矛盾，和资本主义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发展的一切需要的矛盾愈是长久地勉强被保持下去，它就愈加强烈地促使专制制度瓦解。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口，一攻就垮，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自己，即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由哪些阶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要不确定这一点，革命这一口号在目前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内容的口号，因为专制制度的虚弱无力使得大公们和《莫斯科新闻》³⁸也变成“革命者”了！要不确定这一点，那就根本谈不到先进阶级的先进的民主任务。而用来确定这一点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确定新上层建筑的新“建筑者”可能而且应当依靠哪些阶级，又能确定这一上层建筑是什么性质（和社会主义专政不同的“民主”专政）和采取什么建筑方式（实行专政，即用暴力镇压暴力的抵抗，武装人民中的革命阶级）。现在，谁不承认这个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不承认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政府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那他不是根本不了解革命的任务，没有能力确定当前的时局所提出来的新的和更高的革命任务，就是滥用“革命”这一口号来欺骗人民，出卖革命。

马尔丁诺夫同志和他的那班朋友属于前一种情况。司徒卢威先生和整个“立宪民主的”地方自治党属于后一种情况。

马尔丁诺夫同志真是又机灵又精明，正好是在革命的发展要

求人们用专政的口号来确定革命任务的时候，竟责备起别人用专政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概念！马尔丁诺夫同志事实上又不幸做了尾巴，在已经过去的阶段上搁了浅，结果竟停留在解放派的水平上，因为目前适合于解放派的政治立场，即适合于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正是承认“革命”（口头上的革命），而不愿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事实上的革命）。自由资产阶级现在以司徒卢威先生为代表表示赞成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时，新《火星报》方面的一位聪明人却跑出来干涉双方的争论，叫道：可别用专政的概念来“代替”革命的概念呀！看吧，说新火星派的虚伪立场注定他们要永远做解放派的尾巴，这难道不是说出了真理吗？

我们已经表明，解放派在承认民主主义方面是一步步上升的（这里面并不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鼓励推动作用）。起初，我们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希波夫主义（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呢，还是要立宪主义？后来是：要有限制的选举呢，还是要普选制？再后来是：承认革命呢，还是去和专制政府做经纪人的买卖？最后，现在是：承认革命而不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还是承认这两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专政要求？很可能连解放派先生们（至于是现在的解放派或者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中的继承者，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还要上升一步，就是说，很可能过一些时候（也许是在马尔丁诺夫同志也上升一步的时候）也承认专政的口号。如果俄国的革命顺利地前进并且获得彻底的胜利，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时，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又将怎样呢？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

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民主革命实现得愈完全，这个新的斗争就会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纯粹，愈坚决。“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既表明现在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局限性，又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为争取工人阶级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而进行新斗争的必然性。换句话说，当民主派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再上升一步的时候，当革命成为事实，而且连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

三 庸俗资产阶级的专政观 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梅林³⁷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注释中说，资产阶级的出版物曾经责难《新莱茵报》，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Marx' Nachlass^① 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得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们的马尔丁诺夫就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在新《火星报》上举行的那个“新讨伐”的结语中说，《前进报》和《无产者报》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

① 《马克思遗著》。——译者注

是因为列宁“很想尝尝幸福的味道”（《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马尔丁诺夫解释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

1848年9月14日的《新莱茵报》写道：“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内阁首脑）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即反动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展开公开的斗争。”³⁸

梅林说得很对，这段话把《新莱茵报》在几个长篇论文中所作的关于康普豪森内阁的详细论述归纳成了几点。马克思这段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临时革命政府必须实行专政（躲避专政口号的《火星报》无论如何不能了解这一点）；它告诉我们，这个专政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制度的残余（正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同反革命斗争的决议中清楚地指出的，而是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忽略的）。最后，第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的幻想”而痛斥了他们。从1848年6月6日《新莱茵报》的论文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这段话的意思。马克思写道：“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富有积极性、富有革命积极性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学生那样做议会活动练习，对政府的行动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既然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

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³⁹

专政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会怎样对待那些把“决定组织立宪会议”叫做彻底胜利或者号召“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决议啊！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就这样作过，而且从1月9日起就在全国各地一贯而顽固地继续这样作。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末立宪幻想和象学生那样做议会活动练习，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关于这个专政的任务的问题，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还写道：“国民议会本来应该以专政的办法反对各邦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的舆论中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刺刀……都会碰得粉碎……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⁴⁰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专制不受任何侵犯”⁴¹。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向革命政府或革命专政提出的任务，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

现在再说下去吧：按马克思的意见，当时有哪些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实现这个任务（把人民专制的原则真正贯彻到底，并打退反革命的袭击）呢？马克思说的是“人民”。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

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

在柏林无产阶级 3 月 18 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人民专制；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走向决裂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争得了完全是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而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向旧普鲁士的贵族和官僚建议结盟，立刻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着重号是我们加的）⁴²。

总之，对革命的彻底胜利来说，不仅“决定组织立宪会议”还很不够，就是真正召集了立宪会议也还是不够的！甚至在武装斗争中得到局部的胜利（柏林工人 1848 年 3 月 18 日对军队的胜利）以后，革命也还可能“没有完成”，“没有进行到底”。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是转到彼特龙克维奇和罗迪切夫之流，即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手里，还是转到人民，即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手里。在前一种场合下，资产阶级拥有政权，而无产阶级有“批评的自由”，即“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自由。革命一胜

利，资产阶级就会立刻和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譬如说，如果彼得堡的工人在和军队进行的巷战中仅仅获得局部的胜利，而让彼特龙克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去成立政府，那末这种情形在俄国也是免不了要发生的）。在后一种场合下就有可能实现革命民主专政，即革命的完全胜利。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更确切地确定，马克思拿来和工人合在一起统称为人民而与大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个“民主派资产阶级”(demokratische Bürgerschaft)究竟是指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1848年7月29日《新莱茵报》一篇论文中的下面这一段给了明白的回答：“……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

1789年8月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法国人民在一天之内就战胜了一切封建义务。

1848年7月11日，三月街垒战后四个月，封建义务战胜了德国人民。Teste Gierke cum Hansemanno^①。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① “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迪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要求赎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格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的地产”，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 1848 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⁴³

这是一段很有教益的话，它告诉我们四个重要的原理：（1）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一般地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2）完全实现民主革命的基础是建立自由的农民阶级。（3）建立这样一个阶级，就是废除封建义务，消灭封建制度，但是还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4）农民是资产阶级（即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

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适当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 1905 年的俄国了。毫无疑问，当我们从马克思所阐明的德国经验中吸取教训时，我们所能得出的保证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唯一地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毫无疑问，马克思在 1848 年拿来和那些进行反抗的反动势力及背叛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人民”，其主要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和解放派先生们也正在出卖并且会继续出卖农民，就是说，他们会用假的改良来敷衍了事，会在地主和农民决斗的时候站到地主方面去。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这个斗争中彻底支持农民。最后，毫无疑问，在我们俄国，农民斗争的成功（即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也意味着完全的民主革命，也是进行到底的革命的社会支柱，但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决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即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社会化”。农民起义的成功，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扫清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地和坚决地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道路。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象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

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为了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在 1848 年的观点，必须指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用当时的语言来说的话）和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听听梅林是怎样说的：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论文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并行而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还有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⁴⁴。无论如何，很惹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蒂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 1848 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的。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

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 1849 年 4 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东（东普鲁士）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

可见，只是在 1849 年 4 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机关报”！这件事，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在 1848 年还落后，在经济方面落后，在政治方面也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在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马克思仅仅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足见德国当时的全部气氛都充满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开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例如，在我们这里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外，根本谈不到这种报纸即使有一分钟会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

可是，在马克思和斯蒂凡·波尔恩之间刚刚开始显露出来的那种对立，在我们这里却以成熟得多的形式存在着了，而且俄国革命民主巨流中的无产阶级支流愈是强大，这种对立就愈厉害。梅·

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斯蒂凡·波尔恩的鼓动工作可能不满时，是说得太缓和，太含糊了。请看恩格斯在 1885 年写的评论波尔恩的一段话（引自《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Zürich. 1885 ① 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⁴⁵ 的盟员到处都站在最民主的运动的前列，这就证明同盟是革命活动的最好的学校。“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Arbeiterverbrüderung»），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Kreti und Plethi）‘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Allen alles sein）。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着重号是我们加的）。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1849 年 5 月德勒斯顿的起义，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

① 1885 年苏黎世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到极点，所以直到 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 Buttermilch^① 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⁴⁶

恩格斯就是这样评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

我们的新火星派也是狂热地追求“经济主义”，甚至博得君主派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头脑清醒”的赞扬。他们也是把各色各样的人纠合在自己周围，奉承“经济派”，用“自动性”、“民主主义”和“自治”等等口号来拉拢落后群众。他们的工会也是往往只存在于他们那个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新《火星报》上。他们的口号和决议暴露出他们同样不了解“无产阶级伟大政治运动”的任务。

① 我在本书第一版内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 Buttermilch 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里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于《两年来》文集内），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⁴⁷ 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绝妙的借口来抹煞 1848 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利用论敌的错误——即使是关于波尔恩的姓名问题的错误，本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利用纠正译文的手段来抹煞有两种策略存在这一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害怕涉及争论的实质。（作者在 1907 年版上加的注。——编者注）

注　　释

1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于 1905 年 6—7 月在日内瓦写的。1905 年 7 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了这本书。同年又在俄国翻印过两次：一次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翻印的，另一次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单独翻印了一万本。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书秘密传布于全俄各地，彼得堡、莫斯科、喀山、梯弗里斯、巴库等城市。这本书，警察在逮捕和搜查时往往一发现就是十来本。1907 年 2 月 19 日，彼得堡出版事业委员会下令查禁此书。同年 12 月 22 日，彼得堡高等法院决定将此书销毁。

1907 年，列宁把《两种策略》一书编入《十二年来》文集中，并补充了一些脚注。列宁在写《两种策略》一书时所作的准备材料——大纲、提纲及笔记等，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315—320 页和第 16 卷第 151—156 页。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书中所发展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和策略原理，被斯大林同志在下列著作中始终不渝地捍卫和发展了：《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1905 年）、《两次搏斗》、《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 年）、《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1907 年 2 月）以及其他著作。

关于列宁《两种策略》一书的历史意义，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84—98 页。——第 1 页。

2 《无产者报》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的周报，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905 年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举行的党中央全会决定由列宁担任中央机关报责任编辑。

《无产者报》从 1905 年 5 月 14 日（27 日）至 11 月 12 日（25 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 26 号。经常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无产者报》继续执行了列宁旧《火星报》的路线，完全保持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传统，列宁为《无产者报》写了五十多篇论文和短评。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文章曾经在各地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转载，并印成了单页。

不久，在列宁启程回国以后，在1905年11月，《无产者报》停刊。该报的最后两号（第25号和第26号）是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辑的。——第3页。

- 3 《解放》杂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双周刊，是1902—1905年彼·别·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的。从1904年1月起成为自由君主派的“解放社”的机关刊物。“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第5页。
- 4 指孟什维克的新《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协助下夺取了《火星报》。从1903年11月的第52号起，《火星报》就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1905年10月。——第5页。
- 5 “布里根委员会”是1905年2月按沙皇诏令成立的，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该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成立咨议性国家杜马的法律草案和杜马选举条例，并于1905年8月6日（19日）连同沙皇诏书一起颁布。布尔什维克宣布，对布里根杜马实行积极的抵制。这届杜马，政府没有召集成功，被革命力量打垮了。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65—172页。——第7页。
- 6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第7页。
- 7 米勒兰主义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流派，因法国社会改良主义者米勒兰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第15页。
- 8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该报的领导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是主编。该报出了第301号以后，在反动势力迫害下停刊。关于《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7—26页。——第18页。

- 9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从 1905 年 4 月至 11 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
- 《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的策略》一文是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诺·饶尔丹尼娅写的。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 7 章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详尽的批评（见本书第 44—48 页）。——第 20 页。
- 10 列宁指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地方自治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德·尼·希波夫的“宪制”纲领，纲领的实质是把沙皇专制制度保存下来，只用“沙皇赏赐的”宪法稍加限制。——第 21 页。
- 11 《俄国旧事》是一种历史月刊，1870 年至 1918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26 页。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3—9 页。——第 27 页。
- 13 列宁所引证的是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erausgegeben von Franz Mehring»*, Band III, Stuttgart, 1902, S. 21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迪南·拉萨尔遗著，弗兰茨·梅林编》1902 年斯图加特版第 3 卷第 211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125 页。——第 42 页。
- 14 指由斯塔罗维尔（孟什维克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假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经过讨论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也批评过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3—62 页）。——第 43 页。
- 15 “议会速”是列宁对机会主义者的一种信念的称呼，这种信念认为议会管理制度是万能的，而议会斗争则是唯一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第 47 页。
- 16 指在 189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讨论土地纲领草案时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第 49 页。
- 17 《工人事业》是“经济派”的杂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的机关刊物，1899—1902 年在日内瓦出版。关于对“工人事业派”观点的批评，见列宁《怎么办？》一书。——第 53 页。
- 18 指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的假名）在刊物上发表的反对列宁《火星报》计划的言论。这种言论，列宁早在 1902 年就在《怎么办？》（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13—500 页）一书中批判过了。——第 53 页。
- 19 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第 13 号和第 14 号上发表的两篇论文：

-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7—273页)。——第61页。
- 20 列宁指的是伦敦的一批参加过巴黎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在1874年发表的纲领(见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9—587页)。
- 布朗基主义者是法国革命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的信徒。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认为布朗基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同时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方式。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期望人类不是经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经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来摆脱雇佣奴隶制。——第63页。
- 21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对这一纲领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第68页。
- 22 列宁于1905年7月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0章里加了这个附注。本书第1版没把这个附注编进去,1926年才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69页。
- 2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14—518页。——第69页。
- 24 列宁指自己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30—449页),以及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批评了列宁所提到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21—540页)。——第76页。
- 25 《Credo》意即信条,纲领,对一种世界观的阐述。1899年一部分“经济派”(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发表的宣言以此名闻。这篇宣言极其明显地表明了俄国“经济主义”的机会主义性质。列宁写了一篇激烈的、揭露性的反对“经济派”观点的抗议书,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6—158页)。——第77页。
- 26 《工人思想报》是“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到1902年出版。列宁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火星报》上发表的论文中以及《怎么办?》一书中批评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认为它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第77页。
- 27 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60页)。——第78页。

- 28 《*L'Humanité*》(《人道报》)是让·饶勒斯在 1904 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社会党在 1920 年 12 月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道报》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第 79 页。
- 29 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是法国工人、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 1871 年巴黎公社委员。——第 88 页。
- 30 指孟什维克在他们的 1905 年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11—520 页)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49—154 页)中,批评过这个“章程”。——第 90 页。
- 3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9 页。——第 92 页。
- 32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 是 1868 年自由资产者希尔施和敦克尔两人在德国成立的。他们也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一样,鼓吹“阶级利益和谐论”,诱惑工人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把工会运动的任务局限于互助储金会和文化教育团体的范围内。——第 99 页。
- 33 恩格斯所著《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译成俄文经列宁校订后,于 1905 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1906 年又在彼得堡翻印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21—540 页)。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 年 3 月),于 1906 年译成俄文发表,作为彼得堡“铁锤”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88—299 页)。——第 101 页。
- 34 从此句以下到“我们已经表明,解放派……”以前的这几段(见本书第 108 页)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第一版里没有刊载进去。到 1940 年 4 月 22 日才第一次在《真理报》第 112 号上发表。——第 106 页。
- 3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31—389 页。——第 106 页。
- 36 《莫斯科新闻》是一种报纸,于 1756 年创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代表最反动的君主派地主和僧侣的观点;从 1905 年起成为黑帮的主要机关报之一;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便被封闭。——第 107 页。
- 37 弗兰茨·梅林(1846—1919 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杰出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是“斯巴达克”革命联盟的组织者之一,后来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第 109 页。
- 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475 页。——第 110 页。

-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5页。——第111页。
- 4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6页。——第111页。
- 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页。——第111页。
- 4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72—73页。——第112页。
- 4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1页。——第114页。
- 44 科伦工人联合会机关报原名《Zeitung des Arbeiter-Vereins zu Köln》(《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报名底下加有«Freiheit, Brüderlichkeit, Arbeit»(“自由、博爱、劳动”)这几个字，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约·莫尔和卡·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从1848年4月到10月共出了40号。后来把自由、博爱、劳动作为该报报名，从1848年10月到1849年6月用这个名称出了23号。——第115页。
- 45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1847年夏在革命无产阶级组织伦敦代表大会上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受同盟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一直存在到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著名的活动家后来在第一国际中起领导作用。见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1—261页)。——第117页。
-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55—256页。——第118页。
- 47 《同志报》是一种日报，从1906年3月到1908年1月在彼得堡出版；它表面上好象不是任何政党的机关报，事实上却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孟什维克也参加了该报的工作。——第118页。

В. И. ЛЕНИН
ДВЕ ТАКТИК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列 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合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兵 杂 出 版

社 会 主 义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 刷

1950年1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3版

1971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

书号 1001·19 每册 0.28元

